

《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系列丛书出版

中国出版传媒报 8月23日,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出版传媒集团主办,山西人民出版社承办的《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系列丛书出版座谈会在太原召开。山西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张云泽,山西省社科院(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原党组书记、院长杨茂林,山西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省级重点智库负责人张晓永,山西财经大学校长、省级重点智库负责人田祥宇,山西省委宣传部出版管理处处长赵新中,山西省委讲师团团长乔卫东,山西省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秘书处处长冯向宇等参加座谈。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胡彦成主持座谈。

会上,山西省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刘晓哲、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姚军分别介绍了丛书编写情况和出版情况。

与会专家学者一致认为,《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面对面》通俗理论读物系列丛书政治站位高、理论视野广、联系实际紧,内容丰富、重点突出、案例生动、数据翔实、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全景式展现了新时代山西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丰富成果和宝贵经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贾新田指出,该丛书具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主题鲜明,内涵深刻。二是说理透彻,入脑入心。三是博采众长,精益求精。他表示,这套丛书的策划出版既是集团壮大主流舆论阵地、服务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的价值追求,也是奋力做精、做优主题出版的一个现实写照。(邛远)

(上接第3版)

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怎么做?



聚焦经典,塑造农业古籍权威品牌

■刘天金(中国农业出版社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

成立64年来,中国农业出版社共整理出版了农业古籍近170种。其中,《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获首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中国古代耕织图》、《齐民要术校释》(第二版)分获第二届古籍整理图书一、二等奖。《司牧安骥集校释》获第四届古籍整理图书二等奖、第六届国家图书提名奖。《齐民要术校释》(第一版)、《授时通考校注》获得国家教委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奖。

中国农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农业生产过程中积累了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农业古籍、古村落、文物古迹、农业遗迹,浸润着先辈们“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和发展理念,渗透着资源永续利用的智慧哲理,是中国特色农业历史学的研究基础,也是中国特色农业经济学的创新源头。对经典农业古籍遗产进行整理、研究、出版,无疑有着深远的意义。

1959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发文明确:“把农业古籍整理出版的任务,由中华书局划归新成立的农业出版社”。可以说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是我社的传统强项。作为农业农村部直属的大型综合性出版社,中国农业出版社(副牌:农村读物出版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和服务三农的办社宗旨,出版了一大批立足三农、服务社会的优秀读物,稳居农业类出版社第一位。

农业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三个阶段 1981年1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其中农业古籍整理出版是重要内容之一。我社农业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可分为三个阶段。

稳健起步,繁荣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成立,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序开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在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指导下,农业古籍整理工作也迎来了难得的繁荣发展局面。截至1993年,我社累计出版农业古籍整理类图书121种,其中严格意义上的农业古籍整理图书精善本、简排本81种,多部作品荣获各类国家级奖项,可以说成果斐然。

攻坚克难,曲折前行。1994年之后的20多年间,我社农业古籍的出版面临了巨大的人力资源压力,一方面,农史老同志全部退休,农史编辑力量极度不足;另一方面,高校专家的研究重点转移,缺少强大的农业古籍整理的专家队伍。面对这一局面,我社组织力量对过去庞大的选题规划,存稿进行清理,重新规划,选择好的版本出版,修订好的版本再版,并增加了图、文献方志类史料的整理出版。

数智赋能,重塑品牌。为适应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今年,我社积极对接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和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结合农业古籍、农业历史出版以及数字出版工作实际,

科学编制了2021~2030年农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中国农耕文化典籍整理出版及数据库建设》。希望借助数智赋能、重塑品牌,推出传扬农耕文明系列图书、数据库产品。

重点发力“图书+数据库”建设 我社根据国家“十四五”农业农村重点工作安排,对标《出版业“十四五”时期发展规划》以及《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按照汇聚、开放、共享的时代要求,秉承专业性,聚焦实用性,坚持创新性,推出中国农耕文化典籍出版产品,对经典古籍重新整理再版,并打造中国农耕文化典籍数据库。

中国农耕文化典籍出版产品包括《中国古农书集成》、“中华农业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中国古农书精选》(典藏本)、《中国古农书总目提要》等。中国农耕文化典籍数据库产品下设5个专题子库,包括中华农业基本古籍库、农史方志档案资料库建设、智慧农史库建设、数字农业文化藏品库建设、中国农谚库。该数据库将提供种类丰富、内容权威、注释详细的电子文献,实现全文检索、文本比对、文本阅读、文本分析等,并配备“经典有声”、专家讲解等学习资源,提升农业典籍文献整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古籍出版,特别是农业古籍出版,面临的困难还很多,但“传扬农耕文明,逐梦农业强国”是我社的使命任务,也是重要的战略方向。我们始终坚持以大历史观来看待农业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聚焦经典、数智赋能、重塑品牌,把中华农耕文明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展示出来,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坚定中国文化自信。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1年建社伊始,以“古今中外,提高为主”为出版宗旨,在古典文学出版方面,出版古籍整理、经典影印和文学选读本等,深耕细作,出版了大量优秀古籍图书。近十年来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杜甫全集校注》12册、《明清戏曲序跋纂笺》12册、《清代诗人别集丛刊》第一辑、《俞樾诗文集》7册、“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8种、“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等。

古籍整理与出版,是个极其专业的行当,其受众面一般较为窄小,但是它对整理者、编辑的知识面要求却极其宽广。从经济角度讲,是投入大,产出少。但它与科技一样,是高精尖,是文化的引领者,技术的先进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明的尺度。因此,古籍整理出版要紧抓、要抓好。

近10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成绩显著,组织资助了大批古籍整理项目,组织研制面向大众的大型古籍数据库,开展了一定规模的人才培训。同时面临一些问题,包括古籍整理人才、古籍编辑人才匮乏,古籍整理成果质量下滑严重,新媒体时代相关批评越来越尖锐等。

今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各个层面都进行了认真学习,切实加强了对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视和支持,对于古籍整理出版是巨大的鼓舞。

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古籍整理方面的选题资源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因项目难度及人手有限,项目完成率不够理想;在古今中外多个板块发力,古籍出版规模尚不足以独立构成大型数据库,数字化规模较小;古典编辑室多名编辑入职时间较短,工作经验尚不足;古籍整理的宣传做得还不充分。针对以上情况,我社调整了思路,着手推进工作。

一是放缓古籍整理开发的节奏,优化选题,往精细化方向转化。二是我社数字出版与科技部针对古籍项目的具体情况,小单元推送电子书,实现拓展盈利。三是加强年轻编辑的培养,老编辑以具体项目的实施进行精心指导,传授经验与技巧,指点规律和盲区,培养年轻编辑选稿、审稿能力,切实引领他们在古籍整理编辑方面日益成熟。以培养一批古籍出版骨干为目标,做到文化的薪火安全传递。四是在古籍宣传上,加强传统书评优势,并借助新媒体,举办经典共读、专题直播,发挥社内社外宣传资源,持续开展古籍图书的营销活动,增加读者对古籍的了解和认可,不断扩大文化的受众面。

为推进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展,个人有如下几点思考。

在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出版单位层面,应该制订人才培养的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不要“赶鸭子上架”,立刻要求产生效益。目前,一些大学开办了编辑专业,应加强学校编辑学习与出版社编辑实践的对接,加大实习力度,使学生所学的编辑知识落实到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反作用于课堂学习,联合培养务实的编辑后备人才。

在古籍项目实施上,应主张减量提质,大小项目搭配。古籍整理细分起来,仍有许多具体的专业划分,要尽量避免非专业出版社和编辑承担专项项目。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资助的范围,过去限制在辛亥革命之前。文化具有延宕性,民国期间,仍有用标准的文言文撰写的优秀诗文,亦当纳入古籍资助的范围。古籍整理包括对古籍的点校、辑佚等,也包括精选今注,后者优秀成果亦当多加鼓励,纳入资助范围。

在古籍项目管理上,应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确保古籍整理的质量。同时,古籍整理存在特殊性,限于整理者及编辑的能力,会存在一些遗留问题——这也是古代做整理同样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承认古籍整理存在不足的客观性,鼓励健康批评,整理者、出版者、读者一同推动古籍事业的稳步前进,才是正途。古籍整理涉及文字的使用问题,规定文字规范化使用,思路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在古籍整理上一定执行一个所谓的“标准”,可能目前尚不成熟。因为对于古籍用字的研究讨论现在很不充分,对于许多文字的理解还很不到位。因此,对于古籍用字,可以采取建议用字,引导使用,不可硬性要求。

这些年来,古籍研究渐益深入,其中一些认识值得认真提炼、总结,有利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深入开展。

整理者、出版者、读者共推古籍事业前进
■葛云波(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文学编辑室主任)

走专业化特色化的古籍整理出版之路

■洪文雄(学苑出版社社长)

近10年,学苑出版社获得古籍整理出版资助490万元,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12种。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中国近代地方戏曲剧本丛刊·第一辑》《中国近代地方戏曲剧本丛刊·第二辑》《傅惜华藏古典戏曲曲谱身段谱丛刊》《隋唐五代宋金戏剧史料汇编》《清宫戏曲档案萃编》《本草图经辑校本》,以及《日本藏中医珍本丛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明代福建海防图》《南直隶与浙江江防海防图》、《力钧研究文献全编》《明季辽事文集丛刊·孙承宗集》《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藏古籍珍本丛书·第一辑》《傅惜华藏古本小说珍本丛刊》。

台书院文献汇刊》《房山碑刻画志》等。

近年来,我社充分发挥古籍出版专业能力,为古籍整理研究者和古籍资源收藏机构做好针对性专业化的出版服务工作,并在出版考核制度上给以支持。在人才培养上,组织专业的古籍文献整理和研究团队;为解决古籍文献资料版本难问题,搭建资源单位和研究整理人员的合作平台;面对经费压力,鼓励编辑积极申报专项资金扶持,并在考核上给予倾斜。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印发后,我社结合自身定位方向,组织全社编辑学习《意见》精神。我们把做好古籍出版工作,放在我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方向定位中来领会。关注中华民族民间文化特色文献古籍资源的搜集整理和开发利用(例如文物博物馆、中医药、科学技术、档案、方志、古舆图等)。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搜集和整理各类民族民间文化典籍资料文

献,记录展现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见》的出台,坚定了我社走专业化、特色化的古籍文献整理路径的信心。

未来,我社将继续在以下几个方面积极开展工作。一是积极谋划,加强规划,强化流程,注重落实。各部门提前布局,策划选题,并对已储备项目进行专门论证,有的放矢地推出古籍精品。发挥重大项目带动作用,构建特色古籍出版生产机制,凸显社会效益。增强团队意识和导向把关能力。二是立足出版定位和自身专业优势,加强古籍出版专业能力建设,积极策划具有专业特色的古籍出版选题。通过系统化培训,召开专题研讨会,邀请资深专家和编辑作讲座,激励推动青年编辑主动策划好的选题,参与重大项目。三是强化制度保障。积极完善双效并重的考核标准,加大社会效益考核权重。加强激励制度,充分调动部门和编辑的积极性,对重大出版项目给予配套奖励。

古籍编辑的经济效益考核,进一步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平衡。我社在“十四五”规划中也部署了一系列动作,主要包括进一步扩大“天津书馆”的规模,重点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类丛书的出版,尤其是加强“大家小书”“新编历史小丛书”的新品开发,巩固好这两个品牌建设、总体营销,让这些有比较潜在市场收益的补贴硬性的古籍图书出版。

为推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及《意见》中的有关部署和要求尽快落地,北京市的配套政策要跟上,要在书香北京建设中加大古籍类图书的分量。我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新配套和保障措施是国内的馆配渠道应该直接对接古籍生产单位,让有价值的古籍丛书更顺利地进入馆配市场。建议主管部门的一些奖项和表彰将古籍出版单列,为古籍出版编辑建立档案,对古籍编辑骨干个体项目实施补贴,让古籍编辑能够更多地走向大众,并且获得更多荣誉。

我呼吁,今后要进一步明确古籍出版的专业性,加强版本意识的培训,包括对审读专家的古籍专业常识培训,避免古籍扶持政策的滥用。

(下转第7版)

加强传统文化普及类图书出版

■高立志(天津出版社总编辑、北京出版社副总编辑)

天津出版社继承了原北京古籍出版社的全部业务,是一家专业古籍社。每年出版品种约200种,其中古籍类四五十种。近10年,天津出版社获得北京市和国家层面古籍资助,包括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约900万元,入选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的项目共6种,国家出版基金项目4种,已经出版的重要项目包括《北京历史地图集》《京津冀古地图集》《侯仁之手稿笔记》《北京古籍丛书》《名典名选丛书》《明清野史丛书》等。

当前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呈现的主要特征是:国家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力弘扬,主管部门的资金扶持,出版单位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出版编辑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怀。

与此同时,我国古籍工作还面临着古籍类编辑不易招、培养时间长,古籍图书生产周期长、前期投入大、后期销售量比较小等问题。近年来,国家、主管部门主要通过资金扶持来补贴,但项目资金难以覆盖人工成本;出版单位的努力主要包括把获得项目资金作为一种社会效益来考核编辑,对于古籍项目的审校增加难度系数,以平衡审

稿量的考核。

当下,天津出版社面临的问题首先是编辑队伍的稳定,其次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考核方面与非古籍编辑的平衡。针对性解决方案就是提高古籍编辑工作的荣誉感,在推优评优方面向古籍编辑倾斜,对于古籍项目的审校考核增加难度系数,以平衡审稿量的考核。目前来说,有一定的成效,但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因为作为企业,出版的生存首先依赖于经济效益。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出台后,我社第一时间组织全体编辑学习,主要研究如何减轻

